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志文学的青年往往潜藏于后台,在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当编辑。几乎是普遍现象,不说通往文学大路的必由之路,也算抄了近道。近水楼台先得月,今日文坛成名的大佬,相当一部分人因此获利得益,上海王安忆、北京刘恒刘震云、南京苏童周梅森储福金、武汉池莉、天津赵玫,当年都曾这么韬晦养志。

# 旧时光里

叶兆言

当编辑做文字工作,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看上去权宜之计,略作分析,就明白也属于迫不得已。八十年代文学热,最早走上文坛一拨人,不是“文革”中的写手,就是五十年代的右派作家,这说明作家除了生活阅历,还要有充分的人文准备。机会总是喜欢有准备的人,有些基本历练不可或缺。文学说到底不只是写什么,还有个怎么写的问题。



## 现实生活

时至今日,文学的路线图并没完全改变,越来越全球化。一位美国佬曾做过分析,预测未来的作家之路,基本上是进大学学习写作,毕业后留校边教边写。条条大路通罗马,文学青年当然还有别的路可走,当编辑或者记者,校园学写作教写作,以上两种选择相对而言,至少或者仍然是捷径。

王峰显然同时走在两条路上,大学学习写作,当副刊编辑。过去这些年,我们没少打交道,他是个兢兢业业的报

刊编辑,到时间就会写信督促。外界觉得我很勤奋,写了许多文章,但不知道很多文字都是编辑逼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写的东西太多,写什么不写什么,常和约稿有关,盯得紧先写,不盯缓写或干脆不写。为此,真该好好感谢王峰的敬业,是他成全了我。

我知道王峰也会不时地写些文字,很自然的事,个人选择去报社,蜗居编辑部替人作嫁,无疑是为了一份文学梦想,为了一个写作野心。这年头,还能怀揣文学梦想和野心的人不多了,岁月如逝,当年的那种风光不复存在,文学早已沦为一种纯粹爱好,成为一种坚守。

写作变得不再重要,可有可无,但是王峰仍然在坚持,断断续续在《南方都市报》,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文章。风格属于小清新省,文学说到底不只是写什么,还有个怎么写的问题。一路,干净明朗温馨圆润,基本上都沉浸在过去。他这本书拟名为“旧时光里的小团圆”,备选的书目还有“旧时光里的怕与爱”,“旧时光里的黑与白”,“回去看看最初的自己”,挑来选去,都在回忆已逝的旧史。

过去美好,旧的时光充满诗意。过去将成为亲切回忆,通过回忆,通过文字记录,旧时光成了风干的蝴蝶标本。每个人都会有过去,都会有不一样的旧时光,人生百态千姿,人生五味杂陈,唯有借助这些过去,借助这些旧时光,才能够丰富又鲜亮地展现出来。

代的大都会,没因为她是乡下人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而嫌弃疏远她。部队小战士、门口保安也成了她的好朋友。在她看来,这比什么都珍贵。现在碰到一些熟人,提及母亲总是津津乐道。

与众多平凡农村女性一样,母亲尤其会操持家务、擅长针线活。没钱买衣服,心灵手巧的她,把老大的旧衣服改给小的穿,姐姐的衣服改给弟弟穿。口粮不够,她去挖野菜、野菜、摘槐树叶、采槐树和榆树叶吃。发霉的煎饼自己吃,好的省给我们吃。母亲烙得一手好煎饼。虽然物质匮乏,但母亲变戏法似地在煎饼上做文章,在煎饼上撒上芝麻,经过高温烤干烤熟成了香喷喷的芝麻煎饼,有营养难得吃一回的鸡蛋煎饼。这成了我儿时最美的记忆。

干农活母亲是个好把式。割小麦、掰玉米,她总抢在别人前头,敢跟男同志叫板,不少人喜欢跟她分在一个组。

母亲教我们要守信,《解放日报》曾以《错过班车》为题刊登乘长途车的母亲,因为答应给一名大学生看行李错过了自己班车的事。在母亲心里,这个班车错得值得。

生命如风,母爱无边,母亲的爱影响我的一生。有一回,准备考军校的我突然生病,虽只字未透漏,母亲竟神奇地出现在数千公里之外我的病床前。不识字的她南辕北辙地从鲁南农村乘火车坐错了地点,到离我营地数百公里的福州(她以为福建就是福州),后几经周折在军代表的帮助下辗转到了闽南偏僻的小镇,再在战友的帮助下见到住院的我,母亲边抹眼泪边安慰我。军

旅生涯,每每执行重大演习、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雪救灾等重大任务,母亲的关爱叮嘱总是在我最危险、最疲惫、最需要时,及时抵达。

最喜欢跟母亲打电话,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如今与母亲交流成了永远的奢求。母亲不识字,却非常通情达理。

记忆像倒在掌中的流水,母亲的爱却芬芳枝桠。母亲是我心中的太阳,是我思想和力量的源泉。走出我的视线,却走不出我的记忆,走不出我的精神世界,永永远远在我心里。母亲是我的全部,我是母亲的延续。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说得真切:“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在看,没有什么感受,你的父母挡在你们中间,等到你的父母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



我越走越远。离开母亲的手心,我成了母亲的影子。相见成了一种奢望,思念成了遥遥无期的冥想。总是聚少离多,总是难得一面。母亲的突然离开,我的天空凄风冷雨,再也走不进母亲的世界。我在这头,母亲已经在那一头,母亲成了我永远的孩子,伸手难及。母亲是我挡风的墙,母亲是我无所不能的护佑。如今母亲成了一个符号,难得一见是梦中。母亲成了一个虚幻,成了若隐若现的寄托。啊,母亲!我的源,我的根,我的眼,我的最,我的天!

曾经我是母亲的苗,我在母亲的怀里头。母亲给我几乎想要的一切,冷暖皆知。感冒了,母亲恨不能替我发烧。时光飞逝,

2003年12月,我随上海市新闻教育培训中心赴英国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参加为期三周的“21世纪的出版”研讨讲座。主办方精心挑选了来自英国大学和出版社的老师为我们授课。在众多的老师中,有三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先到伦敦,在伦敦走访一些出版社后,再去位于苏格兰的斯特灵。我们一出伦敦希思罗机场,就看到一位身材瘦高、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举止儒雅的老先生举着一把伞在迎接,原来他就是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他专程从斯特灵赶来迎接我们并安排我们在伦敦的活动。他看上去有60岁的样子,花白头发,穿着西装,却背着双肩挎包,以致把西装都勒皱了。在伦敦的短短三天中,他安排我们走访了两家出版社和一家伦敦现存最老的书店哈查兹书店,并与英格兰出版家协会座谈。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英国,很想看看伦敦的风光。我们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他却说,伦敦有什么好看的?以后有的是看的教诲。那些出版社和专家是很难约的,机会难得。不过,尽管这样说,在座谈会后他还是安排我们坐车浏览了伦敦市容,在走访大英博物馆出版社前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还推荐我们去参观泰特现代艺术馆,弥补了我们的丝丝遗憾。到了斯特灵之后,也是如此,基本上每周五天都有课。他说,你们来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旅游的。要安排旅游很容易,安排课程才难呢。我们三周的行程和课程都是他亲自制定的。他自己为我们讲知识产权资源模式、专业图书出版等内容。他把讲课的内容做成PPT,上课时手拿遥控器,不时点着投影幕,一副烂熟于心的样子。我们本以为他是出版专业出身,

实际上他是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著作不少,有博物馆学和教会史著作,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希腊文等。我们在大学书店中看到的一本研究异教徒的新书,是著名的企鹅书店出版的,半年中印了三次,其中精装1万册,平装5万册,也算是畅销书了。他是从历史专业转向出版研究的。

## 三位英国教授

高克勤

培生国际出版集团版权部主任莱内特·欧文。培生国际出版集团是全球著名的大型跨国出版商。欧文女士长期在培生从事版权与许可工作,曾供职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等,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版权与许可的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她看上去有五六十岁的样子,说话语速较快,显得十分干练。她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2年,此后就常来,不仅与中国的出版社谈版权,还多次在中国举办过培训课程,著有《中国版权经理人实务指南》(中国法律出版社),可以说她对出版业相当熟悉。她认为,中国的版权贸易正在向正规化发展,与国际接轨。当然,她也不客气地指出还存在一些问题。除了从理论上阐述版权理念、介绍法律规定等之外,她更重视实务问题,如怎样购买版权、如何谈判签约等。她上课很生动。有一节课上,她安排一次角色扮演,让我们两个同学扮演出版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她洽谈购买培生两本书的版权,从而把她讲的版权知识和谈判技巧融入其中。

老师中讲课风格随和、风趣的

身,实际上他是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著作不少,有博物馆学和教会史著作,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希腊文等。我们在大学书店中看到的一本研究异教徒的新书,是著名的企鹅书店出版的,半年中印了三次,其中精装1万册,平装5万册,也算是畅销书了。他是从历史专业转向出版研究的。

老师中只有一位是女性,就是

## 三位英国教授

高克勤

培生国际出版集团版权部主任莱内特·欧文。培生国际出版集团是全球著名的大型跨国出版商。欧文女士长期在培生从事版权与许可工作,曾供职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等,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版权与许可的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她看上去有五六十岁的样子,说话语速较快,显得十分干练。她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2年,此后就常来,不仅与中国的出版社谈版权,还多次在中国举办过培训课程,著有《中国版权经理人实务指南》(中国法律出版社),可以说她对出版业相当熟悉。她认为,中国的版权贸易正在向正规化发展,与国际接轨。当然,她也不客气地指出还存在一些问题。除了从理论上阐述版权理念、介绍法律规定等之外,她更重视实务问题,如怎样购买版权、如何谈判签约等。她上课很生动。有一节课上,她安排一次角色扮演,让我们两个同学扮演出版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她洽谈购买培生两本书的版权,从而把她讲的版权知识和谈判技巧融入其中。

老师中讲课风格随和、风趣的

是出版市场顾问、跨国出版管理专家理查德。他自我介绍,他是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毕业时发现出版赚钱,就投身出版业了。他曾经经营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苏格兰最大的出版社,担任过苏格兰出版家协会主席。后来他不想干了,就卖掉出版社,来斯特灵大学任教。其夫人在一家从事苏格兰出版社图书销售的分销中心工作。他给我们谈出版商务管理,谈一些西方出版社并购的案例。他准备的教案比较充分,不时结合他做出版的经验。第一次上课时他还带来了其出版社出版的书,让我们任选一本。我选了一本苏格兰风光画册。在苏格兰的最后一天下午,他请我们去他家喝茶。他的家在斯特灵与格拉斯哥之间的一座小山上,山上仅有一套房子,已有几百年历史。他自豪地告诉我们,这座山和这套房子已列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因此山上不能再兴建其他建筑,目前就他一家住在山上。除了狗以外,他还养着一群羊。房间墙上的镜框里陈列着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彭斯的手稿,好像这套房子与彭斯还有一点关系。他这一说,顿时使我们激动起来,因为我们熟悉的《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彭斯根据当地父老口传录下的。“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看到彭斯的手稿,想起熟悉的歌词,我们大家都由衷地祝愿友谊万岁。理查德的家是我们英国之行中唯一到过的英国人的家庭,留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回忆。

安德鲁认真,莱内特严谨,理查德风趣,三位英国教授的三种不同风格,在短短的时间里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 为受难的人们服务

沈惠民

1844年,作为新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国内铁轨已长达2235英里。与此同时,英国基督教会伦敦总部也将“传医布道”之路,铺到了开埠仅3个月的海上。受英国基督教会伦敦总部派遣,英国传教士兼医师洛克哈脱(亦译作维魏林,William Lockhart)来到黄浦江畔开创医疗慈善事业。这年2月初,他在城内大东门租借的几间平房里,正式创建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仁济医院的前身“雒氏诊所”。这位“仁济医院之父”在《在华行医20年》中记录:“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医院涌来,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就诊。病人不仅有上海人,还有许多来自苏州、松江和周边其他地区,远至崇明岛。”面对众多病患者,几间平房显然已难以适应。1846年7月,一所中式平房新医院在山东路正式落成,取“仁术济世”之义,定名“仁济医馆”。当年《申报》报道:仁济医馆在开头两年的接诊病人数量高达1.9万人次,1844年至1856年的13年间,共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各种中国病患达15万人次。洛克哈脱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医学专家,近代著名文化人王韬称他为“刀圭高手”,“尤精于眼科……诸如痲痘恶疮、跌打损伤,治之多立愈。”当时,肿瘤切除已成为西医的一大优势,仁济医院早期就顺利开展此类手术,救人无数。洛克哈脱更是备受称赞的“一把刀”。有个男性患者心急如焚地来到医院,恳求医生为其割掉长在前额上的一个巨大肿瘤,已经大到影响了右

尽管小心翼翼省着吃,冰箱里最后一点韭菜花拌黄瓜还是所剩无几,每次品味都满含矛盾复杂,这是母亲亲手制作、生前从遥远的农村寄给我的最喜欢吃的家乡菜。此时,母亲离世已经9个多月。

忘不了今年1月14日那个夜晚,母亲溘然离开,毫无征兆,那一幕终生难忘:母亲安详地躺在病榻上,脸色苍白。一旁的父亲目光呆滞,着急无序地寻找从乡下特意带给我的军功章,这是父亲当年打仗留下的。我的心情降至冰点,泪水滂沱。我轻抚母亲尚温暖的身体,体温虽在,已是阴阳

两隔。再也走不进母亲的世界,心灵的天空一片漆黑。耳畔不停回响着誓言的《求佛》: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睛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往事哗地涌至眼前。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教我们捡到一分钱也要想法给人家,绝不占一分钱小便宜。母亲乐善好施,虽然经济拮据,却经常帮助我们家还穷的人或需帮助的人,哪怕有丁点能力她都会伸出援手,赢得左邻右舍的好口碑。因为她的善良真诚,走到那都有好人缘。即便是给我带孩子的十多年,也结交了不少上海的朋友。上海这么现

## 远去的花芬

葛克友

代的大都会,没因为她是乡下人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而嫌弃疏远她。部队小战士、门口保安也成了她的好朋友。在她看来,这比什么都珍贵。现在碰到一些熟人,提及母亲总是津津乐道。

与众多平凡农村女性一样,母亲尤其会操持家务、擅长针线活。没钱买衣服,心灵手巧的她,把老大的旧衣服改给小的穿,姐姐的衣服改给弟弟穿。口粮不够,她去挖野菜、野菜、摘槐树叶、采槐树和榆树叶吃。发霉的煎饼自己吃,好的省给我们吃。母亲烙得一手好煎饼。虽然物质匮乏,但母亲变戏法似地在煎饼上做文章,在煎饼上撒上芝麻,经过高温烤干烤熟成了香喷喷的芝麻煎饼,有营养难得吃一回的鸡蛋煎饼。这成了我儿时最美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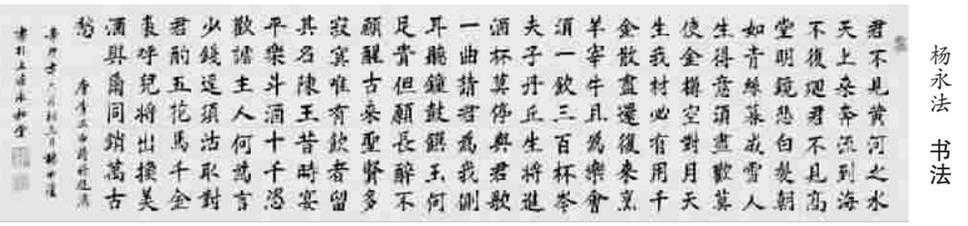
干农活母亲是个好把式。割小麦、掰玉米,她总抢在别人前头,敢跟男同志叫板,不少人喜欢跟她分在一个组。

母亲教我们要守信,《解放日报》曾以《错过班车》为题刊登乘长途车的母亲,因为答应给一名大学生看行李错过了自己班车的事。在母亲心里,这个班车错得值得。

## 高秋

费碟

人入高秋枫正红,鸟鸣穿透层林中。温馨耳热少年境,牵动云雨皆龙凤。



我越走越远。离开母亲的手心,我成了母亲的影子。相见成了一种奢望,思念成了遥遥无期的冥想。总是聚少离多,总是难得一面。母亲的突然离开,我的天空凄风冷雨,再也走不进母亲的世界。我在这头,母亲已经在那一头,母亲成了我永远的孩子,伸手难及。母亲是我挡风的墙,母亲是我无所不能的护佑。如今母亲成了一个符号,难得一见是梦中。母亲成了一个虚幻,成了若隐若现的寄托。啊,母亲!我的源,我的根,我的眼,我的最,我的天!

曾经我是母亲的苗,我在母亲的怀里头。母亲给我几乎想要的一切,冷暖皆知。感冒了,母亲恨不能替我发烧。时光飞逝,

我越走越远。离开母亲的手心,我成了母亲的影子。相见成了一种奢望,思念成了遥遥无期的冥想。总是聚少离多,总是难得一面。母亲的突然离开,我的天空凄风冷雨,再也走不进母亲的世界。我在这头,母亲已经在那一头,母亲成了我永远的孩子,伸手难及。母亲是我挡风的墙,母亲是我无所不能的护佑。如今母亲成了一个符号,难得一见是梦中。母亲成了一个虚幻,成了若隐若现的寄托。啊,母亲!我的源,我的根,我的眼,我的最,我的天!

曾经我是母亲的苗,我在母亲的怀里头。母亲给我几乎想要的一切,冷暖皆知。感冒了,母亲恨不能替我发烧。时光飞逝,

我越走越远。离开母亲的手心,我成了母亲的影子。相见成了一种奢望,思念成了遥遥无期的冥想。总是聚少离多,总是难得一面。母亲的突然离开,我的天空凄风冷雨,再也走不进母亲的世界。我在这头,母亲已经在那一头,母亲成了我永远的孩子,伸手难及。母亲是我挡风的墙,母亲是我无所不能的护佑。如今母亲成了一个符号,难得一见是梦中。母亲成了一个虚幻,成了若隐若现的寄托。啊,母亲!我的源,我的根,我的眼,我的最,我的天!

曾经我是母亲的苗,我在母亲的怀里头。母亲给我几乎想要的一切,冷暖皆知。感冒了,母亲恨不能替我发烧。时光飞逝,

我越走越远。离开母亲的手心,我成了母亲的影子。相见成了一种奢望,思念成了遥遥无期的冥想。总是聚少离多,总是难得一面。母亲的突然离开,我的天空凄风冷雨,再也走不进母亲的世界。我在这头,母亲已经在那一头,母亲成了我永远的孩子,伸手难及。母亲是我挡风的墙,母亲是我无所不能的护佑。如今母亲成了一个符号,难得一见是梦中。母亲成了一个虚幻,成了若隐若现的寄托。啊,母亲!我的源,我的根,我的眼,我的最,我的天!

1844年,作为新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国内铁轨已长达2235英里。与此同时,英国基督教会伦敦总部也将“传医布道”之路,铺到了开埠仅3个月的海上。受英国基督教会伦敦总部派遣,英国传教士兼医师洛克哈脱(亦译作维魏林,William Lockhart)来到黄浦江畔开创医疗慈善事业。这年2月初,他在城内大东门租借的几间平房里,正式创建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仁济医院的前身“雒氏诊所”。这位“仁济医院之父”在《在华行医20年》中记录:“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医院涌来,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就诊。病人不仅有上海人,还有许多来自苏州、松江和周边其他地区,远至崇明岛。”面对众多病患者,几间平房显然已难以适应。1846年7月,一所中式平房新医院在山东路正式落成,取“仁术济世”之义,定名“仁济医馆”。当年《申报》报道:仁济医馆在开头两年的接诊病人数量高达1.9万人次,1844年至1856年的13年间,共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各种中国病患达15万人次。洛克哈脱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医学专家,近代著名文化人王韬称他为“刀圭高手”,“尤精于眼科……诸如痲痘恶疮、跌打损伤,治之多立愈。”当时,肿瘤切除已成为西医的一大优势,仁济医院早期就顺利开展此类手术,救人无数。洛克哈脱更是备受称赞的“一把刀”。有个男性患者心急如焚地来到医院,恳求医生为其割掉长在前额上的一个巨大肿瘤,已经大到影响了右

眼的视力。洛克哈脱将其安排住院。在氯仿麻醉下,肿瘤很快被切除。在门诊病人都得到治疗的同时,医院还适时为部分贫民提供金钱和食物。完成白天的诊疗工作后,洛克哈脱还自己检查医院的药房,准备大量药物以备第二天使用。晚上,他还将第二次查看那些住院的重病人,并随时将意外或突发疾病的患者收治入院。

洛克哈脱“虽做院长亦不支医院薪水”,他整天忙得加班加点,像难以停转的陀螺。据统计,他在仁济医院的19年间,共诊治了20万人。好在有几位优秀上海青年来当他的学生和助手,其中有位黄春甫成为上海滩最早的华人西医师。洛克哈脱在自传中称赞这位年轻人“能非常出色漂亮地完成各种小手术,并且能对予各种常见病进行处方治疗。”黄春甫在仁济医院任职长达43年。

洛克哈脱率先在上海滩上推广免费种牛痘,在几个月内迅速推广开来。到1907年,种牛痘在上海滩推广普及,有一半以上10岁以下中国儿童已接种过疫苗。这项开创性工作为上海以后消灭天花打下了良好基础。

洛克哈脱曾撰《鸦片速改七戒文》,揭露鸦片毒害,并摸索出一些颇为实用有效的临床戒烟方法。1864年,大清朝廷向洛克哈脱赐送“西来和缓”楠木匾一块,表彰他免费施药的仁心、手到病除的仁术。“西风东渐”,吹进了寻常百姓家。

两位教授成功完成我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仁术济世的故事,详情请看本栏。

## 十日谈

两位教授成功完成我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仁术济世的故事,详情请看本栏。

洛克哈脱将其安排住院。在氯仿麻醉下,肿瘤很快被切除。在门诊病人都得到治疗的同时,医院还适时为部分贫民提供金钱和食物。完成白天的诊疗工作后,洛克哈脱还自己检查医院的药房,准备大量药物以备第二天使用。晚上,他还将第二次查看那些住院的重病人,并随时将意外或突发疾病的患者收治入院。

洛克哈脱“虽做院长亦不支医院薪水”,他整天忙得加班加点,像难以停转的陀螺。据统计,他在仁济医院的19年间,共诊治了20万人。好在有几位优秀上海青年来当他的学生和助手,其中有位黄春甫成为上海滩最早的华人西医师。洛克哈脱在自传中称赞这位年轻人“能非常出色漂亮地完成各种小手术,并且能对予各种常见病进行处方治疗。”黄春甫在仁济医院任职长达43年。

洛克哈脱率先在上海滩上推广免费种牛痘,在几个月内迅速推广开来。到1907年,种牛痘在上海滩推广普及,有一半以上10岁以下中国儿童已接种过疫苗。这项开创性工作为上海以后消灭天花打下了良好基础。

洛克哈脱曾撰《鸦片速改七戒文》,揭露鸦片毒害,并摸索出一些颇为实用有效的临床戒烟方法。1864年,大清朝廷向洛克哈脱赐送“西来和缓”楠木匾一块,表彰他免费施药的仁心、手到病除的仁术。“西风东渐”,吹进了寻常百姓家。

两位教授成功完成我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仁术济世的故事,详情请看本栏。

两位教授成功完成我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仁术济世的故事,详情请看本栏。

## 十日谈

两位教授成功完成我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仁术济世的故事,详情请看本栏。

杨永法 书法

杨永法 书法

杨永法 书法

杨永法 书法

杨永法 书法

杨永法 书法

## 十日谈

两位教授成功完成我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仁术济世的故事,详情请看本栏。